

們疼愛的。

有些學生是想看書，卻沒錢買書的，他們坐着或站着看完一本又一本。林海音根本不怪他們，她說：「只要他們安靜的看書，總是件好事。」她從不擔心書會被偷走，她信任他們。

目前，書屋只能容納十餘人，每月利潤只够付冷氣電費。

林海音希望能擴大書屋的空間範圍，擺更多好書，她還想騰出一間屋子，佈置成類似沙龍的聚會地方，供給大家作學術討論、座談。

曾有人建議純文學出版社出些文庫類的叢書，林海音認為：「意見雖好，可惜能力太薄弱。現在我只希望出幾本好書，等基礎穩固了，再出些家庭讀物之類的叢書。」

從她堅毅的神情和過去鏗而不捨的做事態度上，幾乎令人可以相信：「純文學」終能在我國出版界亮起一把永不熄滅的火炬。

出版社和書店介紹之五

傳記文學出版社

程榕寧

兩千餘年前，司馬遷以紀傳體作「太史公記」，談人論事，是世界歷史學界空前的創製。

自太史公後，以至民國紀元五十一年，中國傳記文學的領域上，是一片難堪的空白。

這片在歷史上、在文學上的空白，被一位學歷史的「有心人」——劉紹唐發現了。幾經籌劃，他決定以「不問收穫」的播種者心情，在這片廣大、荒蕪了幾千年，但蘊藏豐富的土地上，辛勤的耕耘。

十年過去了，對埋首艱苦創業的劉紹唐而言，該是怎樣的感受呢？

被四面書牆，遍地書山包圍的劉紹唐（宗向），是一位典型的讀書人，爲了實實在在辦好「傳記文學」雜誌，他嘗盡萬般苦樂。

他當初放棄一切，來創辦在一般人眼中「毫無前途」的「傳記文學」，是有鑒於：「我國歷史悠久，哲人輩出，但自史記以後，很少有幾本可讀的傳記。中國人提到寫傳記，要用自己的筆來寫自己，就不免緊張，感到非常嚴重。原因不外兩端。一是自己寫自己『爲賢者所諱』，中國人素有謙沖的美德，成不居功，自己寫自己縱然非常忠實，也怕遭到自炫或自我宣傳之譏。另一個原因應該說是『爲智者所諱』，寫自己，難免要涉及到當時的政治，更難免要涉及到同時代的人，褒貶論斷，可能惹起許多無謂的糾紛。有了以上兩種顧慮，許多人都覺得不寫也罷，因此造成了我國歷史上的許多空白。幾千年來，正不知有多少有作爲、有成就、有貢獻的人，沒有片紙隻字遺留下來便撒手而去。自己生前不肯寫，死後別人寫不像，只有留待後世史家像沙裏淘金、像霧裏看花一樣的摸索探求。這對整個國家民族來說，真是一個重大而無法彌補的損失。」

因此，他願意以他私人的力量，來做「給史家做材料，給文學開生路」的工作。

當初，劉紹唐以「傳記文學」四個字爲刊名之初，曾遭到一些朋友的反對，不是覺得稿源難以爲繼，就是擔心出版後無人問津。

劉紹唐的看法是：「我認爲，『傳記文學』與其說是歷史，勿寧說是文學。傳記文學是以傳記爲領域的一種文學，任何與傳記有關的文字與資料，都是傳記文學的作品。換言之，任何有關個人的活動紀錄與思想見解的材料，都屬於傳記文學的範疇。傳記文學的蘊藏如此豐富，傳記文學的天地如此廣闊，何患稿源有問題？我以此說服了許多幫忙的朋友，更以此說動了若干爲我們執筆寫文章的作者。」

在作者方面，劉紹唐主張應不受身分，年齡以及任何形式上的限制。他說：「凡是在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，無論成功失敗都可以寫；凡是有特殊體驗的更可以寫。總之，只要與時代不脫節，足以反映時代或爲時代作見證者人人可寫。」

自創刊時，就以「對歷史負責，對讀者負責」自勉的「傳記文學」，到今年十月，已出到第一百廿五期（即第二十一卷第四期），而最難能可貴的是，傳記文學一直是一個學術性與文學性的綜合期刊，態度力求嚴肅，文字却輕鬆雋永，絕不阿諛頌揚或惡意貶損，也絕不以內幕新聞或低級趣味相號召。

在編輯方面，「傳記文學」一直堅守着四大編輯原則：

一、不刊以化名或筆名所發表的文字，即發表時必須署真姓名。為此，犧牲了不少閱讀性很高，且最容易迎合讀者興趣的稿件，並且為拒刊這些文字，難免要花費一番唇舌或筆墨。

二、不刊壽慶應酬的詩文，其中雖不乏富有史料的作品。「傳記文學」寧願冒着「不通人情」或「因噎廢食」之譏而退稿。

三、不刊他處已發表過的，或改頭換面重寫、改寫「炒冷飯」的作品。如遇有必要而選登舊文時，必先交代其原始出處，絕不魚目混珠或故弄玄虛。

四、不刊純做個人攻擊或無謂捧場的文字，「傳記文學」為此開罪了不少作者，但也避免了許多無謂的是非。

在經營方面，劉紹唐也「有所不為」：

一、不利用刊物到處招攬商業廣告。

二、不利用刊物到處要錢或請求津貼。

三、不利用任何關係到處推銷刊物。

「傳記文學」上的廣告，皆是有關「書」的，像商務印書館的每日新書和一些義務刊登的新書廣告等等，每頁只不過索價三百元至五百元可以說純為讀者服務；再如第三項，依現代企業經營的觀點來看，這種做法是有討論的餘地，但，劉先生說：「在此時此地，社會上對雜誌界的成見很深，而雜誌界本身尚未臻健全之時，我寧可犧牲若干可以到手的利益，而保存了，並維護了一個正派刊物與讀書人應有的風格與尊嚴。」這不是「傳記文學」為雜誌界開創什麼新風氣，而事實上，一本雜誌，只有自尊，才會受到社會與廣大讀者的尊重與歡

迎。

在「傳記文學」初問世時，曾大大轟動，前五年裏，可說是一枝獨秀，甚至有每出一期就被翻印一期的事情發生；後來，因模倣的多了，有些讀者難辨真假而分散了注意力，不過，事實證明，任滄海桑田、物換星移，規矩矩矩的「傳記文學」是最站得住腳的。

這些年來，「傳記文學」本身的發展是無可估量的。

在「傳記文學」雜誌創刊後的兩年半，劉先生爲了發掘更多的傳記文學寶藏，也爲了滿足廣大讀者對傳記文學書籍的渴求，在雜誌之外，加編了兩套有系統的書，一套是「傳記文學叢刊」，一套是「傳記文學叢書」，兩者名稱雖異，實質上却無不同，只是版本大小與字數多少的分別而已。

「叢刊」爲廿四開大本，容納廿萬字以上的著作；「叢書」爲卅二開本，字數也較「叢刊」爲少，由數萬字至十數萬字不等。

此外，還編印了一種「傳記文學集刊」，這一些比較大部頭的著作，包括近代重要人物的「全集」或「選集」等，如「徐志摩全集」、「蔣百里全集」等。

劉先生指出，叢刊、叢書、集刊都是「傳記文學」雜誌的結晶，也可以說是發行較久的期刊，必然產生的一種副產品。他們原則是「寧少勿多，寧缺勿濫」。

「傳記文學」的副產品，十分可觀，至今年十月止，計有叢刊廿四種，叢書五十七種，集刊兩種。

在叢刊方面，如王雲五的「談往事」，是一本「片斷的與重點的自傳」；如「劉汝明回憶錄」是劉汝明將軍記述抗戰前，廿九軍在華北苦撐待變的史實；如「銀河憶往」，是屬於臺北近郊「銀河新村」的我國政壇奇才劉健羣的親身經歷的往事及政治秘辛，是研究民國史者的重要參考資料；如「杜月笙傳」是記述杜月笙一生充滿俠義、傳奇與神秘的事蹟，及數十年對國家社會的影響；如「亦雲回憶」，是民國元年至廿五年，影響蔣總統最重要的黃郛先生（曾做過外交部長）的夫人沈亦雲女士，記述她廿五年中幫助黃郛所處理的各樁國家大事，十分有價值……等等。

在叢書方面，如「什麼是傳記文學」是劉紹唐等人，在「傳記文學」創刊時，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探討「傳記文學」饒有趣味的問題；如「齊如老與梅蘭芳」是寫我國國劇史上一段重要的史實；如「秦德純回憶錄」是一部了解西北軍及廿九軍的重要史料；如「勝利前後」，是我國在抗日戰爭前，擔任日本橫濱總領事的邵毓麟所作，他以一個讀書人的良知，寫出抗戰勝利前後的經歷與見聞；……等等。

「集刊」方面，有蔣復璁、梁實秋主編的「徐志摩全集」，共有四千餘頁，分裝六鉅冊，內容之豐富，可謂集徐氏生平著作之大全，是近年來兼具文學價值與史學價值的大書之一；「蔣百里全集」是由蔣復璁（百里先生之侄），薛光前（百里先生秘書）兩教授主編，內容除軍事外，還有極寶貴的蔣氏遺作。

除上述而外，劉先生更編印我國近代史料及一般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等書籍，名之為「文史新刊」，以應知識界之需要。雖然標為「文史」，但與傳記文學廣泛意義，並不違背。

「文史新刊」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開始出版的，至今年的十月止，共有一百六十八種。如梁實秋所著文筆清新、章法謹嚴的「秋室雜憶」，吳相湘教授的「民國政治人物」及「晚清宮廷與人物」都是人物傳記；史學家沈雲龍的「近代史料考釋」，對近代史料考釋精詳，有獨到的見解；孟瑤的「中國小說史」、「中國戲曲史」是作者精心搜集的資料；梁容若的「書和人」使讀者獲知一些書和人的真面目；林語堂博士的「平心論高鶚」是關於研究紅樓夢的人的重要資料；吳敬恒的「上下古今談」是一部奇書，一部科學的通俗小說，為打破一般人所謂「從古所有」的舊觀念；……等等。

另外，「傳記文學史料叢刊」方面，有「杜月笙氏家祠落成紀念冊」及「錢玄同先生傳與手札合刊」。

「民國史料叢刊」部分，計有卅六種，由吳相湘、劉紹唐主編，是極有價值的史料。

十六開本的「傳記文學」，是國內出版界中有份量的雜誌之一，也是海外爭相傳閱的。目前，國內、美、歐、東南亞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圖書館，都訂有「傳記文學」，雖然銷售量有限，但影響甚鉅。

「傳記文學」的海外版，自去年始由香港南天書業公司承印，每期約五千冊。

為了替海外讀者服務，劉紹唐在兩年前，設立「海外讀者文化服務部」，指定專人負責，設立讀者專帳，

一切以便利海外讀者為主。這項措施，是少見的大手筆。

很明顯的，由於「傳記文學」創刊的影響使得社會上對傳記文學已漸重視，許多讀者也開始對人物傳記發生興趣。專門以人物傳記創辦刊物者，紛紛出現；而一般綜合性或文藝性刊物，增加傳記文學篇幅者也不少……這對保存我國近代史料與端正社會風氣，實有莫大貢獻。

劉先生目前正計劃出版的有：

一、民國大事日誌：這是自民國元年至六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六十年間的大事，全書十萬餘條，三鉅冊，每廿年為一冊。

二、民國人物小傳：舉凡民國時代，在各界有影響的人物一萬人，以數十字作成小傳。

這兩本研究學問與處理公務必備的工具書，是讀史者的左右手，將在明年（六十二）年上半年出版。兩書的資料，都是劉先生日積月累積存下來的。

他強調：「今日學史者，有如大海撈針，撈起那一枚『針』，就針對『針』來作文章，却難了解『針』在大海中能起些什麼作用。」如果有上述兩本工具書，當有助於了解國家歷史。

曾在六十、六十一年率團赴香港、新加坡考察出版業的劉紹唐，對中文書籍銷往海外的前途，態度並不樂觀，由於華僑第二代不識中文、各國限制中文、英文好書充斥市面的三種情況，他認為搞出出版業的人士，應好好的動動腦筋、出些好書了。

九月底，由於日本忘恩負義與匪勾搭，引起許多人看抗戰史料方面的書籍，如劉汝明、秦德純的「回憶錄」、「勝利前後」、「從參加抗戰到目睹日軍投降」等，很受歡迎。劉先生正擬進行「抗日八年函史」、「張自忠函傳」等有關抗戰史函，他希望各界能有寶貴的資料提供。

「傳記文學」的主持人劉紹唐，也是名揚全球的「紅色中國的叛徒」的作者（該書有十四種外國文字譯本），正如吳相湘教授在「傳記文學百期紀念」中所言：「『叛徒』的大名已被『傳記文學』超越前進了。」